

艋舺行郊初探

卓克華

壹、前言

鹿港八郊時期，(3)臺北三郊時期。本文擬以臺北三郊時期中之艋舺行郊為主題，作一概略性之探討。

臺灣僻處海隅，梗於交通，開發較晚，初期經濟，屬自然經濟階段，僅求自給自足，至明天啟初，荷人先據澎湖，繼侵臺灣，盤據數年，始終以搜括為能事。榨取臺民膏血，對臺灣之經濟建設毫無貢獻。

明鄭光復故土，以為抗清基地，清廷為絕鄭氏後援，於大陸沿岸厲行遷界移民政策，並嚴禁大陸沿海地區與臺島通商，使沿岸無數居民流離失所，逐有衝破禁界偷渡來臺。而鄭氏生聚教養，一面開拓耕地，一面發展對外貿易，結果農業生產急劇升高，臺灣乃成為大陸外銷物資之集散中心，貿易漸趨興盛。

康熙廿二年，清廷領有臺灣。海禁尚嚴，偷渡之風不減，迨及康熙末年，冒險渡臺墾拓者，幾乎滿佈全臺。由於移民日多，墾拓區域日廣，各項生產日增，貿易隨之日隆。其時臺灣府治之臺南地區已成臺島商業中心，雍正年間遂發展成立大商業團體，即著名的臺南三郊。乾隆四十九年，臺灣中部之鹿港獲准與泉州蚶江通航，鹿港商業亦趨繁榮。乾隆五十七年開放八里坌港，准與福州之五虎門、蚶江來往，於是北部淡水日趨繁榮，商船雲集，闢闢鼎盛，而淡水河上游之艋舺因水利交通之便，北部各郊行咸集該地，全臺形成臺南、鹿港、艋舺三地商業鼎立之局，俗稱「一府二鹿三艋舺」，而艋舺一地且有駁駁乎後來居上之勢。及咸豐年間，艋舺港埠下游淡水河岸有大稻埕之興起，商業隆盛，乃合艋舺、北二郊組成三大商業團體，總名金泉順。至此臺北商業扶搖直上，殆成為全臺物資集散地。

臺島自明鄭開啓，迄日人竊據，凡二百三十餘年，其中有清一代，臺灣為海上交通要衝，商業繁盛行會頗多，實操本島經濟大權，頗有足述者焉。而二百年之行郊史可略分為三期：(1)臺灣府三郊時期(2)

Moungar 之音譯，意指獨木舟或獨木舟聚集之處。蓋其地濱河而膏腴，初僅番人居此，以射魚為生，兼以所產苦茗、蕃薯等物，以獨木舟載運溯淡水河上游之大嵙崁溪與新店溪，與漢人交易，遂得艋舺之名。

臺灣之開發，北部最遲，漢族之拓墾臺北平野，大抵在明萬曆年間，至康熙初年，如地亦不過草寮數椽，人丁寥寥。康熙四十八年有泉州人陳賴章申請來大佳臘堡屯墾（泛指臺北盆地），遂招募漳泉兩地移民，著手開荒，漸由八里坌、士林、新莊，而及於艋舺。初在大溪口搭建茅屋，後再於其東邊之曠地新築民居，形成一小市街。屯墾之初需購糧食裹腹，番胞不時輕載運蕃薯前來與移民交易，此處遂被稱為「蕃薯市街」。（註二）

此後，隨著墾務之發展與移民之激增，艋舺市街之營建急速進行。乾隆初年，漢人入墾臺北盆地者劇增，墾區普及東區之松山、大安、東南區之景尾（今景美）新店等地，而艋舺因水運地位之優越，遂成臺北盆地貨物之集散中心。乾隆五年，泉州之晉江、惠安、南安三邑人士，鳩資建立龍山寺、蕃薯市與龍山寺之間，遂有舊街、新店街、龍山寺街之營建，一時市面繁榮，促進行郊之發達。至乾隆十一年，由各郊商醵金建立天后宮與福德宮，遂又有媽祖宮口街與土地後街之出現。（註二）

艋舺之設市，由最早的蕃薯市發其軼，由此向東向南發展而有舊街、後街、媽祖宮口街……等，構成下最早的艋舺市區。隨著土地的開發與人口移植之大量湧進，商業活動增加，商號、貿易行、船行、客貨棧、行會，亦先後因需要而出現。大批的米糧、木材、藍菁、樟腦、苧麻等，由此裝船輸出，遠銷南北各省，交換外地之特產品與消費品。

商業活動之日益繁興，促進艋舺市面之繁富，姚瑩「臺北道里記」記當時盛況云：「五里渡大溪至艋舺，途中山水曲秀，風景如畫，擺接十三莊在其東南，為北路第一勝境。艋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千家，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闔閭最盛，淡水倉在焉。同知歲中半居此，蓋民富而事繁也。」此時水上商船輻輳，陸地人煙稠密，市廛買賣興隆，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俗諺，咸豐年間，艋舺之繁榮可稱於極盛。

(一) 艙舺的船郊

艋舺商行，種類繁多，約有：茶行、糖行、米行、南貨（販售南北貨食品）、雜貨店（售針線、鞋襪等）、粉行、彩帛店、染房、釀酒、阿片煙店、金仔店、藥店、金紙店、魚行、船頭行……等等，其中以船頭行居多，其他行業則不及。船頭行業既蔚為昔時商界重鎮，執各行業之牛耳，且擁有鉅資，於艋舺有其特殊勢力，加之本身有組織，分別組成泉郊、北郊、廈郊，因此有資格稱之為「行郊」者，僅有船頭行，故艋舺行郊實可單指船郊一行。

艋舺郊行，相傳成立於乾隆年間，初有廣郊，惟旋起旋滅，復有泉州郊、廈郊、繼有北郊。泉郊公號「金晉順」，係以閩省泉州之貿易為主，泉州土地貧瘠，生活物資多賴外地進口，故經營泉郊者，輸出多於輸入，其輸出貨物以大菁、藤、米、苧麻、糖、木材為最多，輸入則以金銀紙、布帛、陶瓷器、鹹魚、磚石為大宗。北郊公號「金萬利」，貿易地區遠至祖國北部數省，並從各地載運臺灣所需物資，其出口貨品以大菁、苧麻、樟腦及木材等為大宗，進口則多為布帛、綢

緞等類。細分之，海產類有鹽向魚、水母等；山產類有烏筍干、皮蛋、鹽蛋、松脂、明礬、桐油、石膏、溫州雞、猪及牛油；雜貨則有刺繡品、綉線、五加皮酒、棉綢布、布燈心、紙傘、草蓆及其他土產品。廈郊公號「金福順」，專對廈門、香港來往交易，經營者為同安人，其詳歷則不可考。（註三）

船郊之貿易情形，據「淡水廳志風俗考」記曰：「估客輶集，以淡水為臺郡第一，貨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樟栳、茄籐、薯榔、通草、簾、苧之屬，多出內山。茶葉、樟腦，又惟內港有之。商人擇地所宜，僱船裝販，近則福州、漳、泉、廈門，遠則寧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廣東。凡港路可通，爭相貿易。所售之值，或易他貨而還。帳目則每月十日一收。有郊戶焉，或購船，或自置船，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稱「頂郊」；赴廈門者曰「廈郊」，統稱為「三郊」。共設鑪主，有總有分，按年輪流以辦郊事。其船往天津、錦州、蓋州，又曰「大北」，上海、寧波，曰「小北」。船中有名「出海」者，司帳及收攬貨物。復有「押載」，所以監視出海也。至所謂「青」者，乃未熟先耀，未收先售也。有粟青，有油青，有糖青，於新穀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時，給銀先定價值，俟熟收而還之。菁靛則先給佃銀種，一年兩收。苧則四季收之，曰頭水、二水、三水、四水。其米船遇歲歉防饑，有禁港焉，或官禁，或商自禁；既禁則米不得他販。有傳幫焉，乃商自傳，視船先後到，限以若干日滿，以次出口也。

「淡水廳志」成於同治十年，蓋其時艋舺船郊貿易之情形也。惟早期貿易，似以大菁為最大出口貨，其殷盛時淡水河岸經常滿排菁桶。至同治後，口岸對外開放，外國物資，源源湧入，大菁此一土產之染料為之淘汰，出口貨品始以茶葉、樟腦為大宗，輸入則以鴉片為主，次為棉、絲織品、煤油、火柴、磁器、中藥、煙絲等。

艋舺船郊之組織極為鬆懈，不像臺南三郊、八鹿港郊之組織嚴密，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艋舺船郊並無郊規之訂立。艋舺船郊組織採鑪主制，鑪主下有數位頭家，其奉祀以關帝爺、觀音佛祖、媽祖為主神

，置有一份公業（田租），一切開支均由其收入支付，惟鑑主之職責僅有祭祀事宜之主持，其他有關郊行之重要事宜，則由幾家大行郊主持。除非有重大事件，臨時召集諸會員商討外，否則於每年崇奉之主神誕辰時，衆會員均須出席祭拜聚餐，主持人於聚餐時將一年來之收支詳細報告，會員有意見也於此時提出，其形式頗似今日之會員大會。

。鑑主按年輪流，不得連任，於每年媽祖誕辰日改選，屆時以擲筭凶吉之多寡而決定下任之人選。（註四）

船郊郊戶，初設於後街仔（今桂林路市警局第二分局一帶），後均屬集舊街（西園路）一帶。北郊著名之行號先後有：王益興、洪合益、張得寶、莊長順、吳源昌、德泰、何大昌、安記、吉泰、白棉發、德記、老順德、吳成興、榮德、建發、永成、源吉、晉源、江萬和。泉郊著名之行號先後有：李勝發、榮發、德吉、德春、源榮、源振。順益等。（註五）

艋舺雖先有泉郊，北郊則後來居上，其勢力雄霸一方。船郊的發達，使得淡水河畔商船屬聚，帆影林密。而貨物之搬運起卸均由黃、林、吳六大姓包辦，彼此為爭奪利權常起衝突，後商聚分配地盤，由黃姓據大溪口碼頭（第一水門），林姓據王公宮口（第二水門），吳姓據滬尾渡頭（第三水門），彼此才相安無事。（註六）

（二）其他的行商

艋舺商行除船頭行組成郊外，其他尚有賭場組成之「金寶興」，生魚行之「金海興」，屠宰業之「金得利」等。「金」字之義，據「廈門志風俗記」內云：「合數人開一底舖或製造一船，則姓金，金猶合也。惟廈門如此，臺灣亦然。」如此，則「金」字表合作之意也。

艋舺其他行業著名之行號今略述於下：（註七）

(1)染房：榮德、協和、白棉發、王協興、廖德記、金源勝、蔡德成、裕成。

(2)彩帛行：老德利、德豐、洪集成、洪懷德、李勝發、黃泉春。

臺灣一文獻

(3)鞍商：盛記、泉泰、復泰、協成。

(4)魚行：瑞成、協成、金源興。

(5)釀酒業：鼎美、源濟堂、榮發、芳華、綿美。

(6)中藥店：萬安、周慶茂、宏生局、聯昌、張和昌、林固春、林協興。

(7)阿片煙店：裕源、東昌、德昌、陳源美。

另有黃祿嫂其人，於夫黃祿死後，繼承遺業，開設「料館」，經營木材，遠近馳名，成為鉅富，其所居地遂名之「材館口街」。

要之，郊商中以廈新街（今西昌街）之張德寶，頂新街（西昌街）之吳昌、王益興、李勝發、林卿雲、林春峰、舊街何大昌，大厝口（華西街）之高進清、黃典謨、楊士朝，下崁（萬華車站一帶）之林光和，料館口（環河南路二段）黃祿嫂等最有名，其留傳事蹟猶播頌於艋舺父老口中。行商的分佈為：布帛行集中於頂新街、廈新街，而頂新街與廈新街為後起之街，店舖櫛比，為艋舺末期最熱鬧繁榮之街道；舊街多為船郊所居，其他如經營雜貨、綢緞之行商亦多開設於舊街，不過日據後船郊凋零，少數遷移至土地後街（西昌街）；布埔街（第三水門附近）則很多染房。

三、艋舺行郊的沒落

道咸年間，艋舺市況已臻於極盛時期，其後發生一連串事故，使得艋舺衰微，失去往日一枝獨秀之盛況。

咸豐三年，三邑之頂郊人與同安之下郊人發生衝突，引起一場大械鬪，俗稱「頂下郊拼」，結果同安人敗退入大稻埕，雙方損失不貲。咸豐四年艋舺流行瘟疫，人畜罹災，損失慘重。咸豐九年，分類械鬪再起，俗稱「漳泉拼」，為漳人與泉州人大械鬪，持續二年之久，雙方筋疲力盡，始言歸於好。艋舺經此數年之浩劫，元氣大傷，加之同治年後，外國商人紛紛來臺開設洋行，收購茶葉、樟腦、艋舺居民不能把握機會以增進地方繁榮，反施以種種壓迫，外商不得立足，只得將洋行移設於新興之大稻埕；更兼淡水河川日漸淤塞，年年洪水之

冲刷變更港勢，使得船舶靠岸困難，艋舺市面日漸蕭條，行商紛紛遷徒至大稻埕。

大稻埕之建街，始於咸豐元年，惟其時人煙疏落，未成市集，迨頂下郊拚，下郊人戰敗，舉族播遷至大稻埕，刻意建設，加速發展，於是拓殖日盛，萬商雲集，不旋踵間，工商市況已凌駕艋舺之上。嗣各大商聚議共設一社，爲之廈郊，名曰「金同順」，置爐主董事，並定生理規條，舉林右藻爲金同順郊長。後艋舺之泉郊金晉順，北郊金萬利見其勢力日長，前來加入，彼此重相議定，將泉、廈、北三郊合立一社，名爲「金泉順」，公舉林右藻爲三郊總長，合設三埕會館於大稻埕。惟此舉無補於艋舺每況愈下之頹勢，不久乙未割臺，艋舺行郊更遭遇一大惡運。（註八）

我拓臺先民，於前清時代，遷臺墳居者，從事墾殖較少，多屬營商，不作長久定居之計。是故光緒乙未割臺，日人割佔臺灣，所有大陸來臺之郊商紛紛歸籍，艋舺、大稻埕之郊商亦復如是。逗留者僅部份小郊商，進退維谷，心存觀望，商業一時陷於停頓。兼之日人據臺，深懼郊行在民間之勢力，或迫其解散，或改組爲「組合」、「配合組合」，納入管制，甚且逼之改組爲純宗教團體，廢其昔日之商業性質，至是傳統之「行郊」不復存在。

艋舺之商行自日據後又呈現另一面目，以販售日本、歐美雜貨爲主，而原有之船郊，因淡水港之淤淺，爲新興之基隆港所取代，加以時代進步，海運發達，船郊之老式木船自不能與航速快，裝貨多之貨輪比較，遂被淘汰。泉郊金晉順於日據後不久結束，北郊金萬利則苟延殘喘，賴有一份公業之收益，於每年關帝爹聖誕之日，仍繼續推舉鑑主管理。至民國三十年（昭和十五年），被迫改爲理事制，推選李朝北爲理事長。（註九）

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後，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原有之公業被徵收，幸賴葉傳世先生力爭，折以四大公司之實物債券，經兌現得二十餘萬元，存入龍山區第三信用合作社，由林有慶先生保管，每年以所得利息辦宴聚餐。（註十）北郊留傳至今日猶有十七家：李億記、謝源

興、葉瑞德、吳源吉、吳成興、黃德吉、林德興、王永成、林吉泰、林德泰、陳協記、吳源昌、賴德記、王順益、李安記、王鎰順；每年於農曆四月廿三日（媽祖誕辰）、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九月初九（媽祖飛昇日），今年負責人爲李雲龍先生，仍於每年媽祖誕辰日改選。要之北郊雖留傳至今，惟已非昔日之性質，已純於粹屬神明會之性質了。（註十一）

肆、結語

臺北盆地原是山胞居所，昔年草木叢鬱，荆榛滿目。直至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陳賴章渡臺，在大加蚋堡結聚民衆，開墾土地。乾隆五十七年開放八里坌口岸，艋舺於焉繁榮，至道咸間達於極盛，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諺稱。惟咸豐以下屢生械鬪，加以淡水河岸日漸淤淺，遂趨衰微，直至今日。

艋舺形勢並非不佳，其地點適在新店溪與大嵙崁溪之交會處，昔年河寬水深，可泊大船，無論由海口溯淡水河而上，或順河直出海口均稱便利，且東北與城內、大稻埕毗連，西南直通板橋，形勢極佳。惟後來淡水河床之淤淺，時代潮流之進步，於是形勢一變。滄桑變幻，日趨蕭條，艋舺之式微誠乃無可奈何之事！

艋舺兩百年來之滄桑，其榮枯固繫於一水，然其中郊商之影響亦不可忽略，其興也郊商雲集，其微也郊商紛散，但兩百年之發展，則郊商亦盡其力襄助，促進艋舺地方建設之繁榮。如艋舺各大寺廟，無論創建或重修，郊商均參與之，有名者如龍屬寺、慈雲寺、新興宮、水仙宮、土地廟等均是，而寺廟與地方之發展息息相關，舉凡治安、產業、交通、教育、聯誼、娛樂……等，莫不透過寺廟以推行，我拓臺先民往往運用寺廟推進地方建設，興辦地方慈善事業，進而教化百姓，平定變亂，維治社會之治安。

他如艋舺有名之郊商鉅富，平日無不排難解紛，救災卹貧，凡地方有事則踴躍捐輸，共襄義舉，或修橋樑、或捐義倉，或助軍餉，或設棲流所，或置義塚、義渡……，大凡艋舺地方之福利事業、教育

事業，無不有郊商之血汗金錢所在，甚且外地之公益事業亦儘力襄助

，如新竹現存之義渡碑與義塚碑，均有艋舺泉郊、廈郊與其他零鑄之行號之鑄名，可證郊商之義薄雲天，罄款相助他地慈善事業。

綜上所述，艋舺行郊對地方之影響實鉅，非但操縱經濟之大權，左右民生，且凡屬社會義舉，如鳩資紓難、社會救濟之類，亦莫非行郊是賴，雖小至修橋鋪路，排難言紛，亦多由行郊醵金爲之，其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實足吾人重視探討，惜史料有間，莫可詳考，尚乞前輩、專家指正。

註釋

- (1) 詳見廖漢臣，「艋舺沿革志」，臺北文物二卷一期
(2) 同上
(3) 參見臺北市志沿革志一章四節第三項艋舺之興起吳逸生，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4) 吳春暉，「艋舺的古社團」，臺北文物八卷三期
(5) 同註三
(6) 同註一
(7) 同註三
(8) 吳春暉，「艋舺志沿革志」，臺北文物二卷一期
(9) 吳逸生，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10)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11) 吳逸生，艋舺三巨富起家談，臺北文物五卷一期
(12) 吳春暉，艋舺寺廟記（同上）
(13) 郭芬芝，臺北懷古談，臺北文物五卷一期
(14) 吳逸生，艋舺寺廟記（同上）
(15) 吳春暉，艋舺的古社團，臺北文物八卷三期
(16) 吳逸生，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17)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18)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19)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20)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21)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22)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23)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24)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25)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26)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27) 吳春暉，艋舺古社團續述，臺北文物九卷四期
(28) 吳春暉，艋舺古行號概述，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29) 吴叔璥，臺灣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四種，臺銀經濟室出版
(30) 蔡相輝，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六十五年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乙、書目部份

- (1) 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社會篇，卷四經濟志商業篇
(2) 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卷四社會志宗教篇、社會福利篇（志稿），卷六經濟志商業篇，卷八文化志名勝古蹟篇，卷九人物志（志稿）
(3) 臺灣省新竹縣志，卷十一藝文志
(4) 黃叔璥，臺灣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四種，臺銀經濟室出版
(5) 姚瑩，東槎紀略，叢刊七種
(6) 臺灣雜誌合刻，叢刊二八種
(7)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叢刊三十種
(8) 臺灣教育碑記，叢刊五四種
(9) 臺灣私法債權編，叢刊七九種
(10) 臺灣私法商事編，叢刊九五種
(11) 周凱，廈門志，叢刊一七二種
(12) 陳培桂，淡水廳志，叢刊一七二種
(13) 連橫，臺灣通史，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14) 周憲文，清代臺灣經濟史，臺灣研究叢刊四五種，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印
(15) 方豪，方豪六十至六四自選待定稿，學生書局
(16) 蔡相輝，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六十五年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附言：本文從拙稿「艋舺行郊考」節刪而成，原稿長達三萬字，今以篇幅所限，減刪正文並略去詳細註解，只將參考資料詳盡列出以供有志者參考。